

马 烽

MA F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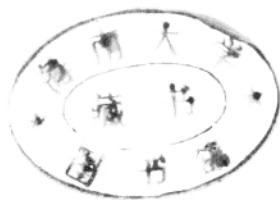
代表作

鄭
子
舟
覺

PDG

马 烽代表作

蔺羨璧 刘景春 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A0172635

(豫)新登字 01 号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马 烽 代 表 作

蒯羨璧 刘景春编著 责任编辑 曲 哲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插页 1 字数 300000

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215-02138-6/I·227

定价:11.60 元



作 者

我们俩，历来是描写农村生活的。我们心目中的读者对象就是农民及农村干部。写小说当然可以，但我们发现农民中读小说的为数极少，比较起来还是~~电影~~拥有广大的农村观众。因为近年来，电影放映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差不多每个乡都有~~电影~~放映队，甚至有的村里就有电影放映机。这就给广大农民欣赏文艺节目提供了极大方便。这也是我俩乐意写电影剧本的原因。虽然写电影剧本比写小说要麻烦一些，但我们也在所不惜。今后如果有可能的话，也许我们还会再度合作写^(反映农村生活的)电影剧本。

凡 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由南开大学中文系组织编选的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中、短篇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均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成员

主 编 郝世峰 于友先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友先 刘家鸣 刘福友

张学正 张学植 张菊香

郝世峰 崔宝衡 曾广灿

蔺茨璧

前 言

马烽是以赵树理为首的“山药蛋派”的重要成员。他全心全意为农民写作，是新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作家和电影文学作家。

1

丁玲谈到新文学的特点时说：“中国的文学作家历来多是与政治有不解之缘的，无法分开的，社会条件决定了这种关系。”（骆宾基：《悼念丁玲同志》）这一论断是符合新文学发展的实际的。作为新文学史上具有鲜明特点的“山药蛋派”，无疑是中国革命的产物；而作为这个文学流派的主要成员马烽，由一个仅上过几年小学的苦孩子成为著名作家，无疑也是和中国革命分不开的。

马烽，原名马书铭，一九二二年生于山西省孝义县居义村。父亲是清末的秀才，母亲是“续亲”。父亲病故，他们孤儿寡母就陷入了苦难的深渊。隔山兄弟的挤落，还债的艰难，出于无奈，母亲只好老女归根，带上书铭投奔汾阳县东大王村娘家。她经常教育书铭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人没有点志气，活得还有啥意思。”书铭听话，便把母亲的教导记在心上。为了生活，他干过繁重的农业劳动和其它农村活计。封建家庭的

尔虞我诈，强者的骄横，弱者的眼泪，他都感受过了。所以他后来回忆说：“人们每当谈起故乡的时候，总会引起点美好的回忆，我的故乡留给我的恰是一些痛苦，旧社会的那种人情冷暖，炎凉世态，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马烽：《忆童年》）

马书铭的童年不但饱尝了人世的艰辛，而且还受到了文化的启蒙教育。他在小学里念过《百家姓》、《三字经》、《论语》、《孟子》一类的古书，还偷偷看了《彭公案》、《施公案》、《大八义》、《小八义》、《三侠五义》、《说岳全传》等章回小说。这便培养了他听故事的兴趣。他喜欢听母亲讲神鬼、狐狸一类的故事，尤其是喜欢听一个叫联珠的表兄讲村里人的生活故事。他在《忆童年》中深有感触地说：“他用一些生活细节，就能把那个人活灵活现地描画出来。他的语言既生动又风趣，经常逗得人们哈哈大笑，而他本人却一本正经地讲述。我觉得听他讲故事，比在学堂里念那些不懂的书，更有趣得多。”这样，便顺理成章，由听故事，进而“胆大妄为”给别人讲故事。他所以能说服母亲同意他参加革命，也是和他给母亲讲《精忠传》里岳母刺字的故事分不开的。

一九三五年冬天，马书铭未学完高小就被招入第二战区随营学校。这个学校具有亦兵亦学的特点。因为是兵，所以就穿上军装，接受军事训练；因为是学，所以就又从事政治训练，还搞办墙报一类文化娱乐活动。他说：“我是由于一次偶然的失误，混进文艺队伍来的。”这究竟是一次怎样的失误呢？说的是有一次上级决定要以排为单位进行墙报比赛，这天正赶上马书铭值班做饭。不巧的是端饭时他失手将面汤撒在了还未贴出去的墙报的报头上。这可闯下了大祸，同志们埋怨，排长更是恼火。也难怪，

因为报头是墙报的门面，而这个好看的报头又是特地请连部的文书画的。眼看就要贴出去比赛，生是给人弄坏，这怎能不怨声载道呢！于是，排长就命令他立刻画个报头出来。马书铭懵了：这不是打鸭子上架吗？但军令是不容违抗的。下软蛋求饶又与马书铭的本性不合，别无选择，只能变着法争这口气。是上帝的恩赐，还是聪明过人？搜索枯肠，想来想去，他想起曾经看过力群的一幅反映抗日战士英勇杀敌的版画，于是就照葫芦画瓢，搞了一张临摹，好歹总算救了急。然而，万万没想到，比赛的结果，他们的墙报居然还中了头名状元，更没有想到他居然还被连队作为美术人材选进了宣传队。

然而，搞美术是否符合他的个性？马烽说：“我当时其实没有画画的才能和兴趣。”可终于在一九四〇年被派往延安进鲁迅艺术学院文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美术。不料，又来了一个“无巧不成书”。没学几天，他就因病进延安医务所治疗。马书铭喜爱文学，碰巧医务所的指导员也喜爱文学。指导员见他学习勤奋，便主动从鲁艺图书馆借书给他看。马烽是这样描述这一段读书经历的：“他借来的书，大多是文学名著。……我先后读了鲁迅、茅盾、巴金、老舍、丁玲等作家的一些作品，也读了些苏联革命题材的小说，越读越有兴趣。特别是艾芜的《南行记》给我印象最深。觉得很亲切，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写小说也不难，只要把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写下来就行了。这当然是一种幼稚的想法，但也鼓起了我练习写作的勇气。”（马烽：《我的第一篇小说》）

这就是说，经过这一段文学的自我修养，他已找到了能发挥自己个性的前进目标。处女作《第一次侦察》的成功，更使他看到了实现这种目标的希望。马烽管这叫做是他“走向文学道路的

第一个脚印。”这个脚印又是怎样踏出来的呢？

马书铭从医务所出来，又回到艺术干部训练班学美术，到一九四二年被派往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美术股工作。但其时，他的兴趣已全部集中在写小说上了。这样，他便写了《第一次侦察》。稿子登在剧社的墙报上，由于意外地获得了好评，便又鼓起勇气，寄给了延安《解放日报》。这真是有心栽花花绽开，署名马烽的《第一次侦察》居然被采用了，并且还出了单行本。这对一个苦苦追求文学创作的革命青年，是多么大的鼓励啊！从此，他走上了文学之路，马书铭终于成了马烽。

烽者，取抗日烽火之意也。表明他献身抗日烽火的决心和信心。显示这种实绩的是他和西戎合作的《吕梁英雄传》。

写了《第一次侦察》，接着他又写了《张初元的故事》，并荣获晋绥边区文艺奖。这样，于一九四四年他便被调到《晋绥大众报》工作。《吕梁英雄传》就是他们一九四五年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边区的群英大会写成的。由于它运用了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以故事结构见长的章回体小说，所以一在报上连载，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书中的主人公雷石柱一时间也便成为吕梁山上老幼皆知的抗日英雄。至今马烽回忆起当年群众欢迎《吕梁英雄传》的盛况还兴奋地说：“群众爱听抗日故事。”《吕梁英雄传》的问世，使以赵树理为首的“山药蛋派”初具了规模，使马烽的小说创作向驾驭长篇跨进了一步。

这一时期的创作，从内容看，集中在反帝反封建上；从表现形式看，注重了敷衍故事和群众语言的运用，但在形象塑造和性格刻画上却缺乏应有的功力。

一九四九年马烽怀着胜利的喜悦到了北京，一九五一年进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经过这一次深造，扩大了他的文学视野，追

求创作的欲望更加强烈。这样，寻找创作源泉的问题，便又被尖锐地提了出来，是留在北京就地写作呢，还是回到故乡再写吕梁山的生活呢？不言而喻，故乡的人，故乡的语言，故乡的风俗民情，深深地吸引着他。于是在一九五六年他就又毅然回到山西安家落户。根深才能叶茂。马烽所以能写出小说《四访孙玉厚》、《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刘胡兰传》和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洋溢着革命激情的作品，确是他热情拥抱故乡生活的结果。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是马烽这一时期创作的中心主题。从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看，这一时期的创作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特别是在塑造形象，刻画性格上显示了真的功夫。赵满囤、田副局长、孙玉厚、刘胡兰等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胡兰传》通过对刘胡兰的环境的创造，广泛反映了山西农村的乡俗民情和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它标志着马烽驾驭长篇小说这一文学形式达到了新的高度。

跨入了历史的新时期，马烽又焕发了创作的青春。然而这种青春的焕发，来之又是多么不易啊！其时，他已年逾花甲，十年动乱迫使他搁笔。如今又要重操旧业，这是需要很大毅力的。在《马烽短篇新作·后记》中他是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的：“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帮’之后，我逐渐又有了写短篇小说的冲动，时时跃跃欲试。但真的动手写起来，却遇到了不少困难。木匠师傅三天不拿锯子，都有点不顺手。何况我已经有十五六年不写短篇小说了，其不顺手可想而知。提起笔来，不是找不到合适的词，就是忘了要写的那个字。最主要的是思路不顺。脑子里那些素材，怎么也捏不到一起。”他还记得曾将试写的短篇，请一个同志看，看后的印象是：“有些情节倒有点意思。整个看起来不

行。拉拉杂杂不知你要说个甚。”看，创作能力的衰退，竟然达到如此惊人的地步。然而，马烽毕竟还是马烽。他是决不会辜负党和人民对自己的期望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还要豁出老命作“垂死挣扎”。马烽新时期的创作就是从这儿起步的。经过努力，他居然又“挣扎”出一个小说和电影文学创作的双丰收来。他出版了小说集《马烽短篇新作》，其中《结婚现场会》获一九八〇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与孙谦合作的《新来的县委书记》（电影改名《泪痕》），获一九八〇年《大众电影》举办的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咱们的退伍兵》获第六届金鸡奖特别奖。这表明马烽的现实主义得到了深化，也表明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反映新时期的生活仍然有用武之地。

中国革命造就了马烽。马烽的道路，在同辈作家中有代表性。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

2

马烽的旗帜上写的是现实主义。他遵循的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反映生活的创作原则。

作家的创作实践，总是受其创作主张所支配的。马烽是坚信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一真理的。在具体阐述这一主张时，他说：

“一个作家，无疑应该有想象。可惜我没有那么丰富的想象力。我只能‘照猫画虎’，离开实际生活，我就什么也写不来了。”（马烽：《马烽小说选·自序》）又说：“有一种说法，认为要提高作品的质量，只有和当前的现实生活拉开距离，要尽量摆脱政策的影响。我对这种观点是持反对意见的。说要摆脱政策的影响，这是一种妄想。政策是客观存在，它具有时代的特色，是时

代的烙印。就拿农村来说，农民就不可能不受各个时期农业政策的左右。作家应该是了解、研究、熟悉政策，而不能摆脱，也不应摆脱。”（马烽：《点染朝霞的人·序》）这就是说，他所反映的生活是贴近到了反映具体政策影响下的现实生活的；而根据这种实际生活提炼主题的走向时，他又突出一个“新”字。他说：“所谓‘新’，就是要大力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群众，积极反映生活中新生的、革命的、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新事物。”（马烽：《短、新、通》）又说，如果不注意研究历史的新时期变革中的农村的“新的变化，就不大容易反映出今天农村新的面貌，新的时代气息，新的农民形象。”（马烽：《农村题材也应当广泛些》）但他又不停留在浅层次地歌颂新人新事上。在给成一小说选《远天远地》所作的序中，他说：“最重要的是他的作品没有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对现实既没有粉饰贴金，亦没有歪曲丑化。”这也是他自身创作的甘苦之言。这样，面向新的世界，贴近生活，以敏锐的感受力和洞察力及时迅速地反映新的社会矛盾，便构成马烽的现实主义及其审美的基本特征。

马烽是纵跨两代的作家。他成名于四十年代，但他的主要成就就是在当代。下面，我们就对他不同历史时期的创作加以巡视，以描述其现实主义发展的历史轨迹。

《吕梁英雄传》、《金宝娘》和《村仇》可以代表马烽民主革命时期的现实主义成就。这些作品反映了四十年代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热情歌颂了新的世界、新的人物。这个世界之所以新，就因为他们意识到了翻身求解放的必要。很显然，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吕梁英雄传；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村仇》中田铁柱和赵拴拴的喝和合酒；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金宝娘》中金宝娘的“人性复

归”。雷石柱的成长，田铁柱、赵拴拴和金宝娘的觉醒，都是在新世界的光辉照跃下实现的。雷石柱精明强悍，英勇果决，能征善战，是四十年代前期北方农村全新的抗日英雄。金宝娘、田铁柱、赵拴拴是转化中的人物。民族的压迫，生活的艰难，使金宝娘丧失了女性应有的尊严。地主阶级的相互倾轧，使田铁柱、赵拴拴反目，变为仇人。但由于作者着眼于反映新的世界，因此渲染田铁柱、赵拴拴和金宝娘的愚昧、落后与不幸，目的却是为了突出土地改革对于贫苦农民的警世作用。写旧是为了显新，揭露地主阶级和旧社会的罪恶，是为了强化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才能走向新的觉醒。

这就是说，面向新的现实，贴近生活，不回避矛盾，在他前期的创作中就已形成一种属于他自己所特有的现实主义的思维态势，而这种现实主义的发展与深化，却是在他当代创作中完成的。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致力于恢复经济的巨大工作。城市工业的发展，有力地冲击着农村的那种传统的守旧的社会心理状态。《一架弹花机》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村这种新的矛盾冲突。小说的情节，是围绕一架弹花机展开的。宋师傅是弹花的劳动英雄。可太原一解放，城乡打通了，合作社买回一架弹花机，便使张家庄因袭着的那种弹花的习惯势力，再也不能保持平静了。究竟是用宋师傅的弹弓弹，还是用弹花机弹？这个问题被尖锐地提了出来。然而，两相比较，从现实功利看，人们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弹花机。就这样，小说通过弹花机战胜了弹花弓，批评了保守，赞扬了先进，歌颂了新的生产力和新社会给农民带来的光明前程。

《饲养员赵大叔》捕捉和传递的又是另一种新的社会信息。

中国农村经过了土地改革，变封建地主所有制为小农经济所有制。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这就又提出一个改造农民的私有观念问题。一九五三年李准写了《不能走那条路》，提出了土改后防止农村两级分化的问题。一九五四年马烽写《饲养员赵大叔》又提出了成立了农业社后也还有个克服社员的私有观念问题。《三年早知道》中的那个赵满囤在这篇小说中就已经抛头露面，他自私自利，喂牲口“耍奸取巧”，弄得意见纷纷，怨声载道。它暗示了克服赵满囤们的小农经济私有观念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性。小说从歌颂光明切入，准确地把握了合作化初期刚刚显露出来的社会矛盾，无疑是具有新意的。

一九八一年出版的《马烽短篇新作》中，马烽还特地把《一篇特写》、《四访孙玉厚》和《杨家女将》等旧作附在了新作的末尾。这是值得深思的。

这三篇作品和《一架弹花机》、《饲养员赵大叔》一类作品相比，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格调。后者所揭示的是正确路线与农民身上的那种消极的历史沉淀不相适应的矛盾。前者所揭示的是政策的倾斜与党的传统作风相抵触的矛盾。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三篇作品的主题“都是歌颂那些在工作、生产中，能实事求是，敢于实事求是的一般干部和普通社员；同时也揭露批判了那些装门面，慕虚荣，弄虚作假的恶劣风气。”（马烽：《马烽短篇新作·自序》）其中《四访孙玉厚》特别有代表性。孙玉厚是村支书，他从实际出发与过急、过快的极左干扰发生尖锐的冲突。说的是一九五五年冬天，孙玉厚苦心经营起来的初级社刚刚得到巩固，县里的刘副部长便要他立刻转高级社。孙玉厚深知自己的家底，只好硬顶。他说：“老天爷！群众还没有这么高的觉悟，社

里还没有多少公共积累，乍一取消了土地分红，没劳力的户怎过呀？他要把我们培养成全县的旗帜。我说：‘死猫扶不上树。我们社不是材料。’”这种从实际出发的正确态度，却被批评为“小脚女人走路”，是“保守主义”。以后刘副部长又盲目追求高产，强迫密植“金皇后”，又遭到了孙玉厚的抵制。结果反被诬为是欺骗党，成为斗争对象，乃至把所有的帽子都给他戴上，还几乎受到法律制裁。因此，他便气病交加含冤死去。政策倾斜到致人于死地的境地，是马烽建国后前十七年干预生活作品中的最深刻的篇什。这篇小说写于一九五七年。它所反映的正是一九五五年以后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左倾教条主义的干扰下，由于指导政策的“过急”、“过粗”所造成的悲剧。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它干预生活的准确性和深刻性，已为历史的经验所证实。

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把那种“过急”、“过粗”的弊端，发展到了顶峰。这种鼓虚劲的政治气氛，不但破坏了农业生产的规律，而且也破坏了文学创作的正常情绪。现实生活中的那种放卫星“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的升虚火劲头，在众多作家的创作中都程度不同的有所反映。马烽写于这一时期的某些作品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太阳刚刚出山》等，也留有这方面的痕迹。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到，它们的主导倾向是没有脱离现实主义的轨道的。这表现在作者选择题材，提炼主题时总是透过现象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反映人们的那种苦干实干的精神实质上。如果将这一类作品和《我的第一个上级》对照加以考察，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马烽这一时期的创作倾向。

《我的第一个上级》写于一九五九年，和上述作品面对的是同样的社会现实。但它却没有留下任何时代弱点的印记。它突现